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五十八卷第一期

2013 年，58 (1), 1-27

doi:10.3966/2073753X2013035801001

# Plato 《理想國》與 Gilman 《她鄉》烏托邦 主張及教育思想比較研究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 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 Plato 《理想國》與二十世紀 C. P. Gilman 《她鄉》作為探究對象，並比較分析兩者烏托邦主張及教育思想之異同。兩者均為歷史中重要的烏托邦及教育思想文獻，也有類似共產社會的觀點，然而，兩者設定烏托邦之基本原則及所呈現出來的教育風貌卻大相逕庭。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方法，探討並比較了兩人的烏托邦教育思想，並且闡發了烏托邦在現代社會中教育的重要性。研究結論如下：一、在現代社會中，具備「反偶像崇拜傳統」精神的烏托邦主義，可能才是烏托邦真正精神之所在；二、比起理念論式的「靜態烏托邦」，現代社會中吾人需對演化論式的「動態烏托邦」投以更多關注；三、Plato 與 Gilman 欲培養之女性形象可說幾無二致，但兩者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對於「母性」或「母職」的看法。Plato 並未正視「母職」的重要性，但 Gilman 却賦予「母職」最崇高地位。此一差異對我們重思教育定義可說極有意義。

關鍵字：母職、《她鄉》、烏托邦、教育思想、《理想國》

---

通訊作者：方永泉，E-mail: t04007@ntnu.edu.tw

收稿日期：2011/11/09；修正日期：2012/02/15、2012/11/30；接受日期：2012/12/21。

## 壹、前言

教育基本上是一種「希望工程」，是一項對於未來的改變懷抱有深切期待與高遠理想的志業。在西方的教育史上，不少學者在提供其教育計畫時，多半是以較為激進的方式提出，某些重要作品甚至更具有烏托邦的意味，例如 Plato (c.427- 347 B.C.) 的《理想國》( *Republic* ) 以及 J. J. Rousseau 的《愛彌兒》( *Emile* )。惟不容否認的，在高舉教育與社會改革理想的文獻中，烏托邦作品常常帶來許多爭議。因為烏托邦具有「不可實現性」本質，加上其他某些特性，遂使其實現背後也蘊藏著許多危機。A. W. Green 就曾歸納了 Plato 到 G. Orwell 的烏托邦，認為其具備兩項共同特徵：一、既存的「現在」被視作可以用計算的方式來決定未來；二、至於所謂的「未來」則被認為是，其較所有的過去及現在都更強調知識份子的地位。前項天真地假定，透過科學理性主義及相關工程，再加上公共教育，必定可以產生我們想要的社會目的與目標；而後項則主張將烏托邦交與那些知識份子菁英治理，賦予其「世界控制者」( world controller ) 的角色 ( Green, 1952 )。惟不論是何種特徵，都易讓烏托邦流於過度控制及獨裁專斷的危機。

除了烏托邦本身所引發的不安聯想外，教育也常因為其本身的某些特性，而忽略烏托邦思想的重要性。例如，現代社會中教育有所謂「去距離化」( de-distantiation ) 的趨勢（套用 K. Manheim 的術語），亦即教育愈來愈強調貼近日常生活需求 ( Papastefanou, 2008, p. 89 )。再加上，教育活動向來即對脈絡背景具備一定的敏銳性 ( sensitivity )，致使其很容易即接受市場目標的影響 ( Young, 2003 )。而這種教育目標與日常生活及外在目標的近似性，也常使教育工作者無法體察那些較為遙遠或全面的教育目標。這也就是如 Bickman ( 1998 ) 所言的，學校的改革者一直未能「朝向烏托邦來調整」( tinkering toward utopia )，卻只是倒退回到習慣，迂迴地再回到平庸。簡言之，這種「去烏托邦式」的思考習慣，很容易讓教育工作者重回將教育視為日常例行之事，因而在教育事務的處理上流於慣性思考。

基於前述原因，過去有關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其實鮮少特別針對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烏托邦進行系統探究，經研究者透過網路及期刊文獻進行初步搜尋，以往僅有波蘭學者 Meczkowska ( 2005 ) 發表的〈邁向教育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 Towards utopianism of educational thought ) 一文曾針對此一主題進行探究。

不過近年來，西方似乎又重新燃起探討烏托邦教育哲學的風潮。這可能是由於學者體會到，即便在一個講求新奇、績效、實用、改變的現代社會中，重新採取「理想社會」( 容或可能是烏托邦式 ) 的觀念，作為教育中哲學辯論的起點，仍有可能獲致豐碩成果 ( Suissa, 2001, p. 643 )；因其至少可以協助我們重新思考當前教育實踐中的各種預設，保持我們對於教育的想像力與批判力，甚至能夠有勇氣提出自己的論點進行理性論辯。依研究者所蒐集的文獻來看，10 年來就已有下列不少的英文文獻與烏托邦的教育哲學有關 ( Davis, R. A., 2003; Giroux,

2003a; Halpin, 1999, 2001a, 2001b, 2007; Leonardo, 2003; Lewis, 2006; Milojevic, 2003; Olszen, 2003; Papastefanou, 2008; Suissa, 2001)。此外，更有學者從「希望教育學」的角度重新闡述了 H. Marcuse、E. Bloch、P. Freire 與 I. Illich 等人的思想，希望藉以重建教育 (Kahn & Kellner, 2007; Van Heertum, 2006)。

在上述諸作者中，特別是 Halpin 不僅寫作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且更於 2003 年出版了《希望和教育》(*Hope and educ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烏托邦想像」(utopian imagination) 在教育中的角色。另根據 Halpin (2001b, p. 300) 與 Papastefanou (2008, p. 91) 的觀察，2000 年後在哲學與教育哲學的學界對於烏托邦的關注確有重新興起之勢，包括一系列的專書、期刊專號與研討會等，都再度點出了「烏托邦想像」的觀念。

綜合前述分析，與烏托邦思想有關的教育探究，在西方似有重新獲得重視之勢，而且此次烏托邦的研究熱潮除對於公共事務的關注外，尚結合了對於教育實踐價值的重視。從研究者的角度看，我們除對於此股國際性學術潮流應予以正視外，對於教育史研究的工作者來說，重新針對過往著名的與教育有關的烏托邦著作中之教育學說及其意涵重新進行有系統的檢視，以再度發掘那些先知先覺者具有突破現實之想像力的教育智慧，這在一個所謂「去烏托邦化」的世界 (Giroux, 2003b)，並且出現所謂「公共時代危機」(crisis of public time) (Giroux, 2003c, p. 146) 的社會中，應該仍算得上是一種頗有價值的嘗試。

有鑑於前述背景，在西方眾多烏托邦教育思想文獻中，研究者選擇了 Plato 與 Gilman 這兩位一古一今的學者之烏托邦作品，進行比較分析。而研究者之所以以其為研究對象，係基於下列原因：

一、《理想國》與《她鄉》(*Herland*) 均可分別視為 Plato 與 Gilman 最重要的教育代表作品。以 Plato 的《理想國》來說，應該是西方教育史最早的一部重要教育作品，這是歐洲史上第一次有人對教育進行系統的理論闡述，如果我們除了想瞭解歐洲各國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政策之外，還想對全世界所有受歐洲殖民影響之地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有所瞭解，那麼《理想國》就是首選著作 (Flanagan, 2005/2009, p. 12)。另外，Holmes (1967, p. 305) 亦認為 Plato 的《理想國》提供了歐洲教育圖像的基本假定。因此在教育思想史上，《理想國》向來就被視為西方教育思想的開山經典之作。

至於 Gilman 於二十世紀所著作的《她鄉》則備受女性主義者青睞，並被不少女性學者視為其教育代表作。例如 Martin (1985, p. 139) 即在其《重啟對話》(*Reclaiming a conversation*) 中，曾專章探討 Gilman《她鄉》中的教育學說，認為其能提供我們另類的社會及教育之視野。而另一位女性學者 Maloney (1999, p. 109) 則認為 Gilman《她鄉》中提供了一種「社會母職」(social motherhood) 的觀點，使得教育成為一種集體的、人性的與社會的功能。再來，Gilman 在該書中亦提出了許多革命性的教育觀點，如將「生長」視為《她鄉》社會中的基本原理、強調自然、無意識的學習形式等，這些都代表了《她鄉》在教育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理想國》與《她鄉》兩部教育經典，雖處一古一今，但均強調整個社會皆應投入教育工作之中；而兩書作者又分屬不同性別，其間的教育思想與教育主張究竟有何異同之處？其實是個頗有趣且值得探討的主題。

二、《理想國》在烏托邦古典傳統基礎的奠立方面，重要性自不待言。例如 Russell (1945) 在其所著《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遷以「Plato 的烏托邦」為名專章分析《理想國》，並稱《理想國》是歷史上最早的烏托邦。而 Plato 亦因其在《理想國》中的嚴密設計，被 K. Popper 視為「開放社會的敵人」。就此而言，Plato 的《理想國》可說是烏托邦傳統中的「理想城市」或「古典傳統」<sup>1</sup>的創始祖師。

《她鄉》則可視為早期女性主義烏托邦最重要的開創作品。Gilman 在該書中重新概念化了 C. Darwin 與 H. Spencer 關於天擇、性別選擇與勞動分工的概念，建立了一個以女性「生物身體」為主的烏托邦社會 (Hausman, 1998)，因而成為早期女性主義烏托邦傳統的代表作。此兩個古今重要烏托邦作品間，在烏托邦的性質及內涵的論述上，究竟有何重要的相同或對比之處？而這種對此，對於今日有關烏托邦的論述又有何啟示？亦應該是個饒富興味及價值的研究主題。

三、在烏托邦的設計方面，Plato 的《理想國》與 Gilman《她鄉》均假定了一個共產、共子女的社會，甚至也都包含了關於女子教育的論述在內，其在女子教育之主張上，在西方教育史上均有一定的地位。在烏托邦的性質及教育措施上，兩者具備了一些共通處，特別是它們似乎皆偏向「單一性別」氣質之社會的建立。例如 Plato 設計的教育內容除了哲學外，尚偏向軍事與體力的訓練；他甚至主張女子應接受和男子一樣的教育。就此而言，Plato 所主張的應是偏向「男性氣質」的烏托邦。<sup>2</sup>至於 Gilman 則是建立了一個「單一性別」(女性)的社會，並以「母性」及「母職」作為社會的重心，其偏向「女性氣質」應殆無疑義。這兩個類型接近的烏托邦，基於對不同性別氣質的重視，究竟會產生何種不同的教育作為與教育方法？其對於今日性別教育的思考又可提供何種啟發？其實亦為值得探討的主題。

<sup>1</sup> 西方歷史中與烏托邦有關的文獻不少，最早可追溯至古代希臘西元前七世紀時 Hesiod 的《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 中對於逝去之黃金年代的描寫，而這種緬懷過往、嚮往田園簡樸生活的烏托邦傳統，被稱為 Arcadian 傳統或是桃花源傳統；教育思想史中最具有 Arcadian 傳統特色的著作，則首推 Rousseau 的《愛彌兒》。至於 Plato 所代表的卻是另一傳統—古典傳統，Plato 的《理想國》其中所描述的「理想城市」(ideal city) 之理念，對於西方烏托邦傳統產生深遠影響，此一觀念後來又為 More 所承繼。古典傳統的烏托邦最大的特點就在其強調人的「理性」運用，認為理性可以妥適治理安排混亂與失序的自然。另外，古典傳統的烏托邦也強調立法者 (law-givers) 與社會具理性秩序的重要性，他們尤其尊崇古代希臘的哲人 Solon 與斯巴達的立法者 Lycurgus，此二人後也成為烏托邦立法者 (utopian nomothetai) 的「原型」。而 Gilman 的《她鄉》也可視為此一傳統下的產物，惟其中並無哲人王或立法者的設置。

<sup>2</sup> 當代著名女性教育哲學家 J. R. Martin 曾批判過 Plato 的女子教育學說，認為在其主張中完全忽略了「繁衍性」(reproductive) 活動的重要性，而且 Plato 對於與女性連結的特質嗤之以鼻，認為女性須放棄自己的女性特質，變得像個男人，才能夠成為保衛國家的國衛 (Martin, 1985)。

四、在烏托邦的建立途徑方面，《理想國》的建立是以哲學為主，最後並以哲人王（philosopher-kings）作為國家最高的統治者，《她鄉》則受到十九世紀科學思想與社會思想的影響，認為社會應建立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兩者同樣有優生的主張，但在實際的實施上卻大異其趣。若說《理想國》是以哲學為基礎的人治烏托邦並不為過，而若說《她鄉》是以科學為主體，屬於科技治理的烏托邦應該也不致離題太遠。惟此兩種治理方式究竟孰優孰劣？是否各有其缺失？應亦可提供作吾人比較的題材。

五、透過本研究的比較，引介 Gilman 這位女性作家的教育思想。Gilman 是十九至二十世紀美國知名的女性主義者與作家，當其在世時，其最知名作品應該是《女性與經濟》（*Women and economics*），該書被譯為七種語言，並在 1920 年代被採用為大學教科書（Bartkowski, 1989, p. 25）。不過在其死後，其作品與思想亦隨之沉寂，直到 1960 及 1970 年代，女性主義者才重新將她的作品挖掘出土，Gilman 其他重要的著作尚有《黃色壁紙》（*Yellow wallpaper*）與《她鄉》等。Gilman 畢生積極投入寫作與社會改革運動，可說是當時婦女議題與女性主義的最佳代言人。但除了女性主義外，她其實也建構了一套相當具有革命性的教育思想於其著作中，除了前述的 Martin 外，另位學者 Maloney (1985) 更曾專書探究其教育思想。在晚近女性主義論述重新興起之際，Gilman 在教育學術界似乎又重新獲致重視。不過國內教育學界對於 Gilman 的所知尚不多，目前在國內僅有一篇碩士論文進行其教育思想的探討（蔡聿文，2005）。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乃以 Plato《理想國》及 Gilman《她鄉》中烏托邦及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作為進行烏托邦與教育間關係探討的起點。研究者的假定是，這兩個烏托邦社會看似有頗多共通之處，然其建基原則及呈現出來的教育風貌終究有著極大的差距。再則，研究者也希望透過對於已往較被忽略的文獻探討，提供教育思想史研究的不同取向，期許本研究在探討過往烏托邦教育思想的重要意涵外，也兼具拓廣加深西方教育思想探究的意義。而為了對於兩人的烏托邦及教育思想能有著更全面的理解，本研究所探討的範圍也不只包括《理想國》及《她鄉》這兩本著作，亦將旁及兩人其他相關著作，惟鑑於此兩書在兩人烏托邦思想裡的中堅地位，它們仍將是本研究探討的最關鍵作品。

## 貳、Plato 的烏托邦及教育思想

雖然 Plato 並非歷史上首位烏托邦思想家，《理想國》亦非歷史上首部以「烏托邦」為名之著作，然而，在烏托邦的歷史脈絡中，Plato 的身影卻一直不斷浮現，直至十八世紀末以前，其影響力都不容忽視。特別在 Plato 的著作中，烏托邦論者發現到有著一種想要區分需求（need）及慾望（desire）的首次嘗試，而這可說是現代人所面臨之烏托邦問題的核心（Manuel & Manuel, 1979, pp. 110-111）。Plato 的《理想國》不僅賦予烏托邦以「城市」的形體，更提

供了烏托邦的「基本精神」，那就是將人的真實需求及表面慾望予以區分；此後，如何滿足人們的真實需求、並對於過度之慾求予以嚴格管控，遂成為烏托邦的一項重要主軸。

Plato 的烏托邦思想的另一個特點，就在於其試圖透過「社會分工」的正義來達成個人的正義及幸福，在他的設想中，個人的慾望及行為都必須受到完全的控制，這不只是為了社會的正義，也為了個人的正義。Okin (1977, p. 346) 解釋，理想國中所謂的「幸福」其實並非一般所謂的自由、個人權利或機會均等，而是和諧、效率與道德善。在追求和諧、效率及道德善的大旗下，所有公民都不容許擁有個人的利益，包括私人的財產和家庭生活、所受的教育、階級的篩選及藝術、科學的生活等，所有這些都必須置於國家嚴格的、全面的控制之下。而個人生活也如同社會生活一般，需要受到嚴密的管控，如此才能獲得最佳的幸福。簡言之，嚴密監管的社會生活可說是 Plato 正義理想的烏托邦原型 (Hertzler, 1922/1990, p. 106)。這種烏托邦思想原型，最終具體表現在理想國的兩大體制上：一是共產制度，另一是國家的全民教育制度。

其中在共產制度方面，從今日的眼光看來，可能是 Plato 烏托邦思想中最不近人情之處。Plato 主張共妻共子，而為了達成城邦的目標，他還主張廢除家庭制度。這種家庭制度的改變，首先要從婚姻及生育制度的徹底改變開始做起 (Plato, *Republic*, Book V)。Plato 嚴格管制包括男女性關係等私人行為，認為這些都不應再帶有感情和其他不適當的因素；所有的婚姻關係都應該是為了改善種族、強化國家而行。Plato 刻意強調優生的重要，主張人類應該像動物一樣選擇最佳的時機來進行繁殖，甚至於男女交配時，也須在特定節日中以抽籤的方式選定臨時的婚配下進行；唯有經過行政官員所認可之配偶所生育的後代才是合法的後代。

Plato 之所以採行這種不通人情的共產制度，其意仍是為了整個城邦的團結。Plato 相信，真正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以「兄弟情誼」取代「私人利益」；當城邦的國衛過著共產的生活時，才有可能產生共同的情感。

當幾乎所有的公民，在同樣的成功及失敗之時，都同樣地享有其中的甘苦時，這種共有的甘苦情感難道不會將整個城邦結合在一起嗎？(Plato, *Republic*, Book V, 462b)

這種休戚與共的「一體感」，遂成為奠立城邦型烏托邦最重要的精神基礎。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卻也可能使其流於一個具高度同質性的階級社會。Popper 就曾這樣批評 Plato 的理想國：

他是著眼於從城邦的穩定性之條件來重建成城邦，並且他只在統治階級自身內，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統一和力量中，尋求城邦穩定的保證。(Popper, 1913/1986, p. 102)

「理想國」正是 Plato 為了逃離社會變化所帶來之衝突，所提出的一個完美城邦。這個城邦不再有現實世界的混亂，取而代之的是和諧、效率、正義的社會；此一所謂合乎道德與正

義的社會，並非以公平、平等及自由作為其建構前提；相反地，它由三個不平等的地位階層－治者、輔佐及農人工匠一所組成，每一個階層都擔負了不同的社會職責。在這個和諧國家中，每一個公民都會從事符合其本性之事。

在前述的主軸下，《理想國》中的教育帶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具備下列特徵：

一、Plato 的教育計畫重視人為改革的色彩。例如他所規劃之政治、社會與教育制度和當時的雅典社會有著許多的不同，包括重視軍事體育及女子的教育乃至共產制度的規劃等，都具有強烈人為推動的色彩在內，且似乎更接近斯巴達城邦。惟 Plato 的「理想國」也不能單純地視之為斯巴達，因其理想仍與現實的斯巴達城邦有段不小的差距。此在 Plato 後來的《法律篇》(Laws) 中有著更清楚的論述。

從烏托邦傳統來看，Plato 試圖建立的烏托邦屬於「理想城市」傳統，而非隔離於世界之外的桃花源或安樂鄉。這樣的理想城市並非自然形成，而是要經過立法者（執政者）的悉心規劃與設計；當然在進行規劃時，有些條件是無法充分控制的，例如戰爭、瘟疫與天候等，但是為了保持立法時的某種理想性，這樣的國家最好周圍沒有強大的敵人 (Plato, Laws, Book IV, 704c)，以免在立法時得處處遷就現實，無法以最理想的方式來維持政體與法律的穩定性。

Plato 的「理想城邦」儘管具有類似斯巴達的氛圍，然而，它終究不能等同於斯巴達，此點在他於《法律篇》中所設定的三個對話者中有斯巴達人、克里特人以及雅典的異鄉人，而雅典的異鄉人是個中主角，且對斯巴達政治體制有所批判可以看得出來。Plato 的烏托邦更具有強烈的「復古」特性，所主張的理想政體毋寧說更接近於 Solon 至 Cleisthenes 時雅典的「先祖政制」(王恒，2008, p. 118)。研究者認為，不論 Plato 所採取的途徑是否崇古薄今，甚至講求靜止完美，但存在於理想與現實間的巨大差距，才是 Plato 烏托邦思想中的重要張力來源與精神所在。

二、Plato 的教育思想背後有一貫哲學理念，這個哲學理念即其理型論或理念論 (theory of forms or ideas)。Plato 將理型論應用到社會及國家的政治分析上，認為所謂的「最好的國家」就是與國家的理型最近似者，其是由最像神的、最聰明的人所主持的王政，而這種幾近完美的理想城邦如何會產生變動，著實令人難解 (Popper, 1913/1986, p. 89)。

Plato 厭惡變動，主張政治必須徹底地進行整體規劃與變革，特別是要由最有智慧的哲人王來進行統治，這樣統治國家的方式，Popper 將其描述為「烏托邦工程學」(utopian engineering)，其途徑有別於 Popper 另外所講的「細部工程學」(piecemeal engineering)。<sup>3</sup> Popper (1913/1986, p. 376) 解釋所謂的「烏托邦工程學」，篤信凡是合理的行動，一定要有某種目的；而行動的合理程度就反映在其有意的、不斷的追求該目的，並依此目的來決定其方法上；亦即是說我們有了所要追求的某種社會藍圖後，才能考慮實現這藍圖的最佳途徑與方法，進而擬訂實際行動的方案。

<sup>3</sup> piecemeal engineering 在國內教育學界尚被譯為點滴的（社會）工程。

烏托邦工程學相信，目的與達成的手段間有著緊密的連結，這種連結遂使得 Plato 的烏托邦教育思想成為其哲學理念的落實。基本上，Plato 對於政治及教育體制、人口及領土的規劃，以及婚姻與優生制度的嚴格掌控乃至藝術的檢查制度等，都是來自於哲學思辨而非科學實證的結果。Plato 所要建立的烏托邦正是一個「哲學的」烏托邦，這樣的烏托邦最高指導原則是哲人王所具有的「理智直觀」能力。因而它的建立似乎不是來自漸進演化的發展過程，而是來自主事者事前的遠見及周密的規劃。由於它是完美的，所以它不需要有過多的變動，變動代表的是一種腐化或墮落，所以防止烏托邦的變動及墮落，就成為統治者一項重要的任務。

Plato 烏托邦思維方式可歸類為 Jacoby 所講的藍圖派烏托邦傳統。依 Jacoby 說法，藍圖派烏托邦主義是以「英吶」及「分鐘」來規劃未來，從就餐的安排到談話的主題，「藍圖規劃家」都會給出精確指令。然鉅細靡遺的藍圖式設計亦會招致許多危險，最重要的危險是，它們往往更多地表現出對於支配而不是對自由的願望；它們幾乎為所有的人們該怎樣自由行動、生活及談話進行了規定，好像人們不能為自己確定這些似的 (Jacoby, 2005/2007, pp. 7-9)。因藍圖派烏托邦傳統以栩栩如生的色彩具體地描繪了烏托邦的想像，而其所提出的詳細規定及建議也很容易成為其他人攻擊的箭靶，因此常吸引了大部分人們的注意力；再者，藍圖派烏托邦傳統對於公眾利益的重視要重於個人自由，因此對後者常會採取限制的措施，故其也易與極權主義聯想在一起，成為當代一些反烏托邦思想者，如 Popper 及 H. Arendt<sup>4</sup>等人攻擊的目標。

三、如前所述，Plato 所描繪的烏托邦，不只提供了後世烏托邦的外在形式（理想城邦），也供給了某些程度的烏托邦內在精神。包括不重物質享受，強調簡樸生活及友伴關係等，都使得其與後世的烏托邦作品產生精神上的聯繫。這些烏托邦精神延續了烏托邦對於「黃金時代」充滿傾慕想像的 Arcadian 傳統，<sup>5</sup>

從希臘和羅馬有關「黃金時代」的思想到十九世紀對於魔法王國的幻想，以及關於和平、閒適和富足的觀念均表明了烏托邦的特徵；人們往往將它同普世的兄弟情義和共同的工作聯系在一起。(Jacoby, 2005/2007, p. 3)

黃金時代中的「和平」、「閒適」與「富足」，在面臨到實際情境的挑戰以及必須因應城邦時代之現實時，其相應做出的調整，反映到「理想城市」的烏托邦傳統上時便是「備戰」、「各

<sup>4</sup> Popper 著有《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 將 Plato 的烏托邦思想視為是某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另外，Arendt 亦曾著有《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一書對烏托邦主義進行了批判。

<sup>5</sup> Arcadia 一詞來自希臘的一個省份，當地的田園風光後來成為許多學者想像烏托邦的一種基礎，因而成為烏托邦的某個版本。有些學者如 N. Frye 認為 Arcadia 是不同於 Utopia 的概念，其有下列特性：(1)強調人和自然的統合；(2)將人類慾望簡單化，有時則強調簡單慾望的滿足；至於 Utopia 則強調人對自然的宰制，而且尋求一種對於慾望的控制。因此，Arcadian 傳統可謂較 Utopia 更激進（參見 Davis, J. C., 1983, p. 24）。

盡其職」，以及「物質慾望的節制」等。

但在古代社會中，要讓每一個人都享有和平、閒適及富足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夢想，故在實際的環境中，這些夢想的達成終究必須予以轉化。

《法律篇》中一個重要的主題便是在探討，真實世界環境下，理想的政治與社會制度能夠實現到何種程度，並且能夠與人性裡的普遍限制相容到怎樣程度。(Bobonich, 2002, pp. 384-385)

為了要能在真實世界中過著幸福生活，外在享受還是得轉變為內在德性（或德行）。烏托邦的重要精神或理想裡，往往強調生活在烏托邦中的人們具備著高尚品德，其能抗拒物質誘惑，嚮往單純簡樸的生活，他們謹守自己的本份，過著自食其力的勞動生活，並且與其他人保持著休戚與共的兄弟情懷。對於某些主張保持烏托邦想像的學者（如 Jacoby 等人）而言，烏托邦看似完美、靜止及封閉的外在形式，乃至至高無上的烏托邦立法者，實非烏托邦的本質；平和、知足、節制及友愛的烏托邦精神才是烏托邦的要旨所在。

是以在 Plato 烏托邦教育思想中，他刻意凸顯了「德性」的重要性，因為德性是與個人的幸福乃至整體城邦的幸福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也許在 Plato 的觀念中，僅有哲學家才能獲得真正的德性<sup>6</sup>—真正的德性與真正的知識連結在一起，而只有哲學家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至於城邦中其他的非哲學家是無法單憑己力獲得真正的德性。不過當哲學家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後，卻能透過立法的手段，讓整個城邦成為正義的、有德的國家。唯有如此，方能間接地保證人民的幸福或是促成人民德性的提升。

四、Plato 的烏托邦教育思想雖然主張女性和男性可以接受相同的教育，然而，其理想城邦終究是一個以男性氣質為主的男性社會。或許相對於古代其他教育家來說，Plato 已屬重視女子教育者，但另一方面，Plato 所主張的男女共同教育，其實長時間來看並未受到該有的重視。如 Martin 所言，儘管 Plato 的社會及政治哲學成為後世有關國家本質之反思的起點，但其有關婦女地位的論述卻一向受到譏評；Plato 的教育哲學雖然為未來理想教育的形式與結構搭好了舞臺，而其有關女子教育的理論卻一直受到忽視，箇中主因可能與其有關女子教育及地位的論述—包括女性治者、男女共同教育、共產生活以及兒童養育—的說法過於激進之故（Martin, 1985, p. 11）。在某些教育史作者的評價中，<sup>7</sup>Plato 的女子教育由於其強調女子需與男子接受相同教育之故，因而似乎較為進步；惟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Plato 女子教育主張實

<sup>6</sup> 根據 Bobonich 的看法，在有關非哲學家（non-philosophers）可否獲得真正的德性的看法中，Plato《理想國》與其《費多篇》(Phaedo)的主張是一致的，也就是都排斥了非哲學家能夠獲得真正德性的可能性(Bobonich, 2002, p. 43)。

<sup>7</sup> 例如林玉体（1984, p. 51）在其《西洋教育史》就認為男女能力與教育機會同等之說，可謂 Plato 的創見，此在東西方都歧視女性教育的長久歷史中，實在可以大書特書。

則非出自其兩性平等的人性理念，而是基於整體社會建構的考量，這其實與其正義國家之設計間有著密切關係。正因為 Plato 的考量其實出於社會考量而非對人性平等的訴求，因此近來一些女性主義者也開始質疑 Plato 所提出的教育計畫及社會政策究竟有無可能促成女性的充分參與？其是否可能只適用於少數的女性身上？Plato 所重視的是否其實只是當時希臘社會中與被視為男性有關的特質及角色？甚至有人還質疑，Plato 世界觀中所主張的二元論是否與女性主義無法相容？上述問題也成為女性主義學者對 Plato 進行重新評估時所思考的主要問題（Tuana, 1994, p. 3）

而身為女性主義的教育學者，Martin 的批判尤具代表性，她從女性經驗開始反省，批評了 Plato 理想國中的兩個主要設定：同一性及功能性（Martin, 1985, pp. 17-37）。Martin 質問的是，所謂的執行同樣工作者應接受相同教育，但其中的教育卻仍偏向以男性為主的教法及教材。例如，Plato 強調女性應該接受與男性相同的音樂、體育及軍事訓練，然而，其卻未考慮到在男、女不同的成長過程及經驗中，某些事物的學習方式其實是不利於女性的成長經驗，而且假若提供的教材中對於女性仍有某些刻板的印象及歧視時（例如將女性描述為非理性的），則對於同為學習者的女性而言，亦會造成不利的心理影響。

Martin 的另一項批評，則是功能性設定中教育所要培養的社會角色問題。Martin 質疑，Plato 教育主張中所要培養的國衛其所擁有的特質，到底是男性的角色還是女性的角色？Plato 雖然宣稱男女皆可擔負起國衛的重責，然而，從他所歸諸國衛身上的特質—諸如智慧、勇敢、節制及正義—來看，其實仍多為傳統中所視與男性有關的特質。當這些特質用在男性的身上時，多被賦予正面的意涵，但與女性連結在一起時，卻常被視為具有貶義。因此，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若要習得或具備這些特質，常必須面臨他人歧視的眼光與言詞。

Martin 對於 Plato 女子教育的分析及批判，從研究者的角度來說，可說相當地精確及犀利。撇開 Plato 在《理想國》中的主張是否為現代意義下的女性主義者不論，Plato 對於女性的看法其實是相當多面向的（multifaceted），例如，他對於當時雅典婦女的態度是有些嫌惡的，他也否定了非國衛的婦女所具有的教育機會及權利，更重要的是，他所提出的教育模式實際上只著重在某一種領域的社會活動，那就是公領域的生產活動，而否定了私領域與家庭有關的繁衍活動。這使得他的教育模式是一個看似性別平等，但其實卻是一個無視於性別差異的「性別中立」（gender-neutral），甚至是「性別盲」（gender-blind）的教育模式。因此研究者認為，在 Plato 的烏托邦教育思想中，女子教育主張其實仍未做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或性別正義。

## 參、Gilman 的烏托邦及教育思想

在 Plato 之後，鮮少有學者如其一樣激進，主張廢除家庭，並將傳統女性角色一併廢除；不過 Gilman 在其《她鄉》中又重新思考了這種可能性。即便是 Wollstonecraft 這位被視為女性

主義的前驅者，也從未考慮過要廢除女性的傳統角色，而是主張要重新定義它（Martin, 1985, pp. 11-12）。就這點來看，Gilman 顯然較 Wollstonecraft 在女子教育中有關女性角色的論述更為激進。為了表達其激進觀點，Gilman 特別運用了烏托邦形式的小說來闡述其觀點。Kessler 於表述 Gilman 烏托邦小說在其女性思想的重要性時，曾有下列論述：

透過拒絕接受傳統「男性」和「女性」角色的界定，並代之以在主流觀念之外提供清楚的另類選擇，Gilman 迫使讀者去質疑那些建立於性別之公認基礎上之定義行為的界限—她的觀點在 1990 年代時仍顯得要先進於當時廣泛的社會實踐。……在她的烏托邦小說的脈絡下—包括《狄安莎其事》(*What diantha did*)、《移山》(*Moving the mountain*)、《她鄉》(*Herland*)、《與她共遊我鄉》(*With her in ourland*)以及其他片段的「女性烏托邦」—相關的討論發現自九篇較不知名的短篇故事，其中有七篇出自 Gilman 的雜誌《先驅者》(*The forerunner*)。這些故事形成一個群體，和她的烏托邦小說一樣對於社會改造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其中有三篇故事特別提出了男性的改變，以補足其他篇中提及的女性的改變。（Kessler, 1994, pp. 127-128）

在 Gilman 所有的烏托邦作品中，《移山》、《她鄉》及《與她共遊我鄉》被稱為其長篇烏托邦小說的三部曲（utopian trilogy），這三部小說最初均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在 Gilman 自己所編的《先驅者》（1909-1916 年間）雜誌上，不過《移山》這部小說在雜誌連載的 1911 年時即以書本方式印行，爾後一直到 1979 年時，《她鄉》才隨著《黃色壁紙》的重新發現，再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至於被視為《她鄉》續篇的《與她共遊我鄉》則在 1997 年時亦重新出版（曾桂娥，2009, p. 23；Gilman, 1997）。

在這三本烏托邦作品中，Gilman 分別從時間、空間的不同向度來闡述她的烏托邦思想，它們構成了 Gilman 完整的烏托邦圖像，在女性主義的烏托邦作品中亦占有一席之地。在這三本小說中，仍以《她鄉》中的烏托邦思想最為完整，並且提供我們另類的社會及教育觀點（Martin, 1985, p. 139），那就是屬於女性主義的烏托邦教育思想觀點。以往的烏托邦多半以男性為主，例如 More 的《烏托邦》(*Utopia*)、Campanella 的《太陽城》(*The city of sun*)，以及 Plato 的《理想國》中的烏托邦等，基本上都是父權中心。除了 Plato 的《理想國》充滿男性氣質，要求女性與男性接受同樣的教育外，像 More 的《烏托邦》則是將女性定位於家庭之中，要求女性侷限於女兒、妻子和母親角色，女性仍受到男性主導社會的壓迫；而 Campanella 的《太陽城》亦同，女性的地位完全由其生育功能所決定，女性並沒有權利決定該與誰婚配或是何時婚配，而且女性在社會上的作用亦僅限於繁殖後代的生理功能（曾桂娥，2009, p. 14）。

女性主義者亦常使用烏托邦作品的文類來探索有關性別及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理念，並藉以思索性別對於理想社會之發展所可能帶來的蘊義，因而形成了女性主義烏托邦文學作

品。在女性主義的烏托邦中，所謂的理想社會是廣義地被視作「婦女解放」的社會；當然，這樣的社會或有結構及完成度上的不同，然而，其大概皆探討了社會的「意向性改造」(willed transformation)的過程，而且也皆強調了女性在社會改造過程中所發揮的動能 (Forde, 2007, p. 2)。由於烏托邦作品中大都著眼教育作為一種有意向之社會行動的作用，女性主義烏托邦也不例外，從此一角度，它們嘗試了對教育重新做出定義。

以 Gilman 來說，她所處的年代約與著名教育學者 J. Dewey 相同，故 Gilman 亦曾試圖透過教育來創造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但是 Gilman 對於教育的概念及民主的觀點似乎又較 Dewey 更加激進，特別是她思考到應該對於整個社會父權本質有所反動，因此又設計了一套「女性化的教育體制」(feminized educational system) 與女性化的社會。Gilman 將教育中價值、態度與感受，甚至教育內容、方法及哲學都予以「女性化」，主要目的就在弭平社會中因為性別所產生的鴻溝 (De Simone, 1995)。Maloney 將 Gilman 此種「教育的女性化」的觀念稱為「社會母職」(social motherhood)<sup>8</sup>— Gilman 有時自己將其稱之為「人類母職」(human motherhood) (Maloney, 1999, pp. 108-109)。故 Gilman 可說是以「母職」觀念來重新建構教育的意義。

Gilman 認為教育的源頭在「母職」，教育來自於母親對於子女的教養活動，這使得她在教育的主張上，是要使教育「女性化」(to feminize education)。教育的核心不在於「理性的發展」，甚至不在「經驗的成長及發展」，而是在於擴充「母職」於個人及社會制度上。透過對於母職的強調，Gilman 不僅意圖導正長久以來「男造世界」(man-made world) 的傳統觀念，也重新賦予教育新的內涵及意義。在 Gilman 的理解中，「母職」不限於生物的本能或是家庭私人領域之內發生，更要進一步發揮在整個社會制度之中。

在 Gilman 的烏托邦中，「母職」就是最高的社會奉獻 (social service)，其被視為一種聖職甚至宗教 (Gilman, 1979, p. 69)。《她鄉》中的母愛 (motherliness) 不是單一母親對於其子女的慈愛，它還是一種主導社會、影響每種藝術和產業、全面保護所有孩童、給予她們最完美的照顧和訓練的母愛 (Gilman, 1979, p. 73)。對於《她鄉》中的女性而言，男女間情愛（包括性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唯有「母職」才是她們追求的目標，「母職」才是促進整個社會進步的必要關鍵。從欲建立的社會形式來看，Gilman 如同 Plato 一樣，主張要廢除家庭制度，然而，家庭的廢除不是為了消除母性中對於子女的關愛情感，卻是要擴大這種母性情感到整個社會中。Gilman 希望人類社會都發揮這種基於母性所產生的大愛精神，從此角度來看，她的「教育女性化」主張其實蘊含有「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理想在內。

<sup>8</sup> 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不將 motherhood 譯為「母性」而譯為「母職」，在於 Gilman 不僅認為其是人類（或女性）生來具有的天性，亦將其視為需經後天培養的「職分」。

## 肆、Plato 與 Gilman 烏托邦中教育思想的比較

固然 Gilman 認為自己的烏托邦著作係接續了自 Plato 及 More 以降的烏托邦傳統，而她的《她鄉》與 Plato《理想國》中也確有許多的類似之處：如前述兩者均為兩人最重要的教育代表作，而且都具有烏托邦的形式，他們都主張廢除家庭制度，形成一個計畫性的共產社會，甚至亦類似主張要重新形塑女子教育，以培養一種新的女性種族（*a new race of woman*），而且這些女性都具有體態健康、具備專業勞動能力，以及理性因應問題的能力等等。

然自另一方面言之，兩者的教育思想之間終究仍存有不小差異，特別是從其所本的哲學理念著眼時，其在各面向教育主張上可以做出下列的比較：

### 一、文化理想及教育目的方面

從內在精神的角度來看，Plato 的《理想國》仍屬以男性特質為主的烏托邦，而 Gilman《她鄉》則偏向以女性特質為主的烏托邦。這種內在精神的差異也導致了兩者的烏托邦社會產生了不同的「文化理想」（cultural ideal）。如 Martin 所分析的，對於 Rousseau 及 Wollstonecraft 而言，母職是女性的天職（duty）；對於 Beecher 來說，母職成了一項專業（profession）。但對於 Gilman 來說，母職則成了一個文化理想（Martin, 1985, p. 141）。而為了達成此一文化理想，《她鄉》中的教育目的便成了「人人皆為母親」。

如果說 Gilman 的文化理想是「社會母職」，那 Plato 便可說以追求「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為其最重要的文化理想。Plato 的《理想國》為了追求和諧及效率，考量到私有的財產及家庭是促成統治者腐敗的關鍵，因而捨棄了私人領域的親情，同時以嚴苛的理性考核作為晉升人才的唯一標準；對於 Plato 而言，所謂的「社會正義」是先嚴格畫分階級的界限，再讓各個階級的人能夠擔負起不同的任務與社會的角色，而教育的目的不僅在培養人才，更在篩選出社會上所需要的人才。

至於在 Gilman《她鄉》中，儘管每位女性都各有專業位置待其發揮及堅守，然而，她們都具有一個共同身分，那就是「母親」。

《她鄉》中所有的成人都為代理母親（surrogate mothers），但不是現代意義中的代理孕母之意，而是傳統意義下的去愛護、服事那些並非她們親生的小孩。（Martin, 1985, p. 143）

《她鄉》中的每個孩子都不會沿用她們母親的名字，因為後者可能會造成某種相互競爭的緊張關係—就像是現代社會父母競相標榜比較自己孩子的表現一樣—在《她鄉》中，所有的孩子都是公共的「產物」（products），而不是私有財產，正由於如此，在一般社會中存在的

激烈競爭及相互標榜競爭的問題應不致在《她鄉》中重現。而且在《她鄉》中，無論身處何項專業工作，每個人都具有對於社會貢獻最重大的任務，那就是「母職」，這似乎也使得《她鄉》中的人們能處於一個相對較為平等的位置。

## 二、教養方式方面

Plato 與 Gilman 在文化理想上的差異，亦使得《理想國》與《她鄉》在兒童教養的方式上出現了巨大的差距。《理想國》抱持「各守其職、各盡其分」的社會正義觀，故公領域之重要性要遠過於私領域，雖然其與《她鄉》一樣都是視兒童為社會的「公產」，然而，其教養方式是以公領域取代了私領域，兒童（特別是幼童）的照養工作並非 Plato 教育計畫中的要旨，國家最高領導人（治者）的培育才是公共教育計畫的重點。至於兒童的照顧與養育工作，應該不是由在集體生活中接受教育及軍事訓練的女性國衛來負責，而可能是由奴隸階層的人們來進行。

但在 Gilman《她鄉》中，則是將私領域的兒童養育工作擴大至公領域，惟其作法不是以公領域的力量強行介入兒童的養育工作，甚或強力排除母親對子女教養之責。例如，《理想國》與《她鄉》雖都主張以優生學來管制人口的數量及素質，但在《理想國》中是由國家掌控男女婚配的時機，甚至認為應由素質最佳的男女進行婚配以生產出最佳的後代，至於那些最差的男女所生出的下一代則一定不可撫養，「唯有統治者知道這種事情的實施方式」（Plato, *Republic*, Book V, 459e）。在《理想國》中，優秀父母所生的孩子，會被帶到某個城市中某個遠離的養育場所進行照顧；而劣質父母生出的孩子或是其他出生即有缺陷的孩子，則會被藏在及安置在一個祕密及未知的場所<sup>9</sup>（Plato, *Republic*, Book V, 460c）。在養育子女時，母親若有奶水的話則可以哺育孩子，但她不知道哪個是自己的孩子，而且哺育孩子也有一定的時間限制。

而在《她鄉》中，所謂的優生學便是「利用訓練和育種把最低等的類型排除（breed out）」（Gilman, 1979, p. 82）。這種形式的優生是要求生育者「自行」放棄，要求她們先做好相關的準備後，才能準備生育，對於那些不適合生育的婦女則進行說服的工作。Gilman 的看法是，即便婦女沒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但因其仍具有母親的身份可以照顧其他所有孩子，所以對她而言，這並非不能彌補的損失。《她鄉》中的母親若生育了自己的孩子，仍可以知道自己的孩子，甚至可以撫養自己的孩子。在《她鄉》，教育被視為「最高的藝術」（highest art）（Gilman, 1979, p. 82），所以可放心交給那些最好的藝術家（artists）、最能幹的人才及專家來進行教育的工作。

簡言之，在兒童的養育工作方面，《理想國》似乎較重視兒童先天的資質，而且由國家

<sup>9</sup> 照《理想國》英譯者 G. M. A. Grube 的注譯，其認為此處 Plato 無疑地是在建議可將這些有缺陷的嬰孩曝露於荒野而致其於死地，而這種殺嬰方式在古代可說是相當常見的（Plato, 1974, p. 139）。

強行介入，有時甚至為維持人口數量及品質，殺嬰亦在所不惜；至於兒童的照養工作雖有提及，卻似乎偏向迎合實際需求的權宜措施。相對而言，Gilman 的《她鄉》雖亦強調人口的控制，然而卻是以自願方式為之；至於兒童的養育更被視為是社會頭等要緊之工作，需交由最優秀的專家來負責，且這些專家應該享有最優渥的待遇。從這點來看，Gilman 的《她鄉》要比 Plato 的《理想國》更重視兒童教養的工作。

### 三、教育內容方面

除了前述文化理想之不同所導致的兒童養育方式之差異外，《理想國》與《她鄉》雖然都是屬於計畫性的烏托邦，但兩者所根據的基本原則或學科基礎亦有絕大不同。Plato 的《理想國》是基於其現象世界及理念世界二分的「理型論」或「觀念論」，對其而言，愈具有實用性的相關學科，其受到世俗牽絆的影響也愈發嚴重，所以在其國度內，除了體育、音樂、文學等基本科目的研習外，要能躋身最高的統治者階級，屬於抽象思維的哲學及辯證法（Gutek, 2004/2008, pp. 53-54）。而在《她鄉》中，最受到重視的厥為生理學、健康學、衛生學、心理學及運動的養成等與人類心智能力、意志力、社會奉獻之意願等有關的「實用性」學科（Gilman, 1979, pp. 71-72）。而化學、植物學、物理學等學科亦都有所發展，且各學科都觸及藝術且與產業相結合。此外《她鄉》中亦有歷史學、地理學、人類學、天文學等學科，這些學科深具本土色彩，與當地的人文有著緊密的結合。

和她們談話，發現隨處都有相當高程度的智慧（high level of intelligence）。有些人在某件事的知識比其他人豐富，……但幾乎所有人對所有事情都有常識……。（Gilman, 1979, p. 64）

換言之，《理想國》的公民與《她鄉》的住民都具備有一定的知識、相當程度的理性以及基本的教育水平。不過在《理想國》中，知識如同社會階層一樣有著高低之分，只有愈與塵世事務無涉的知識，才能保持最高統治者心智上的清明與正確的判斷力。至於《她鄉》則似乎更重視與本土、生活結合的「實用智慧」，這些智慧不是來自抽象的數學或哲學思辨，卻是奠基於實際生活及社會需要，經過科學驗證後的產物。

Gilman 在《她鄉》中的主張，不啻是其實用主義觀點的一種反應（Upin, 1993）。Gilman 身處南北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的美國，當時美國社會正面臨著各方面的劇變，「求進步」（to make progress）可說是當時最重要的時代主導精神（leitmotiv）（Knewitz, 2006, p. 2）。而在《女性與經濟》及《她鄉》流傳當時，實用主義在像 Gilman 一樣的知識份子間亦廣獲支持，而這也使 Gilman 在其烏托邦世界觀中的某些要點上是與實用主義者（特別是 Dewey）有著相通之處的。這些特點有（Lloyd, 1998, pp. 109-110）：（一）《她鄉》中的科學及政治信念是實際的，而非理論的；是要經由集體來驗證，而非個體；（二）心理學較歸屬於「歷史」而非「個

人生命」；較歸屬於文化而非生理學，而這也構成了《她鄉》中社會理論的特色；（三）女性在新型大學中地位的進步，有部分是來自於當時年輕教授們如 Dewey、Mead 等人的策略性協助，而他們的地位就有如《她鄉》中的心理學倡導者一樣；（四）Gilman 似乎有時也指出，科學可能會造成另一種偏見，引領人類走上歧路。在這點上，Gilman 可能較接近 William James 而不是 Dewey。簡言之，Gilman 的女性烏托邦具備了實用主義中強調「經驗」的特色，此又與 Plato 的觀點存有不少距離。

#### 四、教育及社會進步關係的看法上

由於 Gilman 重視「經驗」的重要性，加上其運用了 Darwin 的某些概念，遂使得其烏托邦具備了演化論的色彩，成為烏托邦中的演化論典範（Hausman, 1998），儘管在演化的原因上偏向了新拉馬克的模式（Neo-Lamarckian models），惟《她鄉》仍可謂是一個不斷地在改變、演化進步的烏托邦，甚至於《她鄉》中的女性種族及其身體狀態也是持續地在改變狀態中。Gilman 一向主張人性具後天的可變性，她在《男造世界》（*Man-made world*）一書就曾有下列的說法：

人性……不是一種立即造成的或是不可變易的事物，它是一種發展的階段；而且它仍在……形成中（in the making）。我們的人性……存在於我們所作之事以及我們對事情的作法中，而不是存在於我們本來就是什麼之中。（引自 Seigfried, 1996, p. 40）

從上述這段話，可以看出 Gilman 所言之「形成中」、「人性存在於其所作之事」等語，其實頗近似達爾文主義中演化的概念。

Gilman 這種「動態的烏托邦」概念又顯與 Plato 理想社會的「靜態烏托邦」有所不同。儘管從烏托邦的形式上來看，Gilman 的《她鄉》可說屬於桃花源或安樂鄉烏托邦（cokayne utopia）傳統。這類烏托邦多半處於重山峻嶺及人跡罕至之處，其在形成之初往往並未與外界互動，也因而得以保有人類本性（女性）中最為質樸、真實之處。

但 Gilman 的烏托邦並沒有停留在這種人類原初的純樸狀態中，而是意圖以這種未受汙染的人類天性—特別是未因傳統男性主導社會而受到的「母性」—作為再出發的原點，重新發展、進化成為一個較好的理想社會。例如 Knewitz 及 Hausman 均認為，Gilman 在進化論的主張上，較傾向於 H. Spencer、L. Ward 等人的新拉馬克模式，<sup>10</sup>而不是原先 Darwin 所主張之「演化式改變的隨意性」，亦即其所主張的是一種目的論式設計，茲以確保人類的進步並非完全出

<sup>10</sup> 拉馬克主義（Lamarckism）的基本原理是生物體生命過程中出現的身體變化（如某一器官或身體某一部分由於不斷使用而發育得較大）能傳遞給後代（參見《大英百科全書》，繁體中文版，「新拉馬克主義」條目）。這個學說由法國生物學家 Lamarck 於 1809 年提出。不過隨著 Darwin 演化論天擇說提出及遺傳學者 G. Mendel 證明其為錯誤，而逐漸受到忽視。新拉馬克主義則是結合了 Darwin 天擇說後的學說發展，包括 Spencer 及 Ward 等，都認為透過人為的設計仍可促成生物的某種程度演化及社會的進步。

於偶然之故 (Hausman, 1998, p. 499; Knewitz, 2006, p. 53)。《她鄉》中的文化會隨著每一代的演進而有所增進，此種增進包含了自然發生的變異，以及透過社會直接影響所產生的進步。例如《她鄉》中的女性因為過著主動而獨立的生活，所以她們的體格也愈益地強壯；而透過在生育方面的控制（優生學），也使得某些特質得以遺傳下去。

簡言之，《她鄉》之所以能不斷地演化及發展，包括了「教育」的人為因素在內。當 Van 等男性對於《她鄉》中的女性在自體繁殖的情形下仍能有如此的多元發展感到驚異時，《她鄉》中的女性一方面歸因於自然中的變異律 (law of mutation)，另方面則歸功於「審慎的教育」 (careful education) 之故 (Gilman, 1992/1998; Gilman, 1979; Hausman, 1998, p. 498)。

相反地，Plato 的烏托邦卻是一個臻於至善而近乎靜止的理想社會，其烏托邦思想似乎也偏向「靜態的」烏托邦。Plato 的烏托邦是一個「理想城市」，而在城邦建置過程中，開始的地理因素頗為重要。<sup>11</sup>Plato 的理想城邦是一個與其他城市有點距離，但又不太遠的地方。以《法律篇》中的 Magnesia 來說，它距離海岸並不太遠（大約 9 英哩），故仍可以發展一定程度的商業及海軍；鄰近沒有任何敵國，故可以和他國進行某種程度的貿易，換言之，該城邦並非處於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狀態。不過弔詭的是，儘管維持部分的開放程度，此一城邦的理想之處，卻非來自於其與外界維持一定的交流開放態度，或在於其能否不斷地演化進步，而是在於擁有最高權力者為具有德性及知識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法律篇》中對話者之一來自雅典的異鄉人就說到，在任何一地方或國家，最高權力如何能夠與審慎 (prudence) 和節制 (moderation) 的品德相結合，那麼就能夠實現最好的政體 (best regime) (王恒, 2008, p. 133)。

在 Plato 心目中，這個最好的政體要維持其穩定性，必須透過教育培育篩選出來的菁英來進行集體的領導，這些菁英必須立基於德性、知識及真理之上來進行統治，而其一旦理想政體建立起來之後，每次的「轉變」都會成為每下愈況的墜落。在《理想國》中，Plato 敘述了從最理想的貴族政體、英烈政體、寡頭政體、民主政體至暴君政體的轉變，每次的轉變都是等而下之的墜落，就如 Popper (1913/1986, p. 235) 所分析的：「Plato 所關注的，只是整體的集體；正義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整體性組織的穩定、健全與統一」。

歸而言之，同樣作為烏托邦的作品，Plato 與 Gilman 雖然有許多的共通處，然而，在內在的精神與理念上卻有著更重大的分歧。除了一般學者所見的「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差異外，更重要的仍是出於其在哲學理念上的不同，Plato 的《理想國》烏托邦屬理型論、觀念論式的不具變動性的「靜態烏托邦」，而 Gilman《她鄉》烏托邦則屬演化論、實用主義式的強調演進的「動態烏托邦」。而這種哲學理念上的差距，也造成了兩人對於教育目的、教養方教養方式、教育內容乃至教育和社會進步關係上的看法差異。Plato 的文化理想是要追求「社會正義」；教育的目的則在「育成」或「篩選」領導菁英；教養的方式則是國家集體積極地介

<sup>11</sup> 因《理想國》中並無其地理位置的描述，故此處參見《法律篇》第三卷與第四卷。

入，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意願被降至最低的地步，而照養兒童的基本母職工作則被貶抑至國家教育體制之外。再者，教育內容則是重視抽象的思辨學科。此外，在與社會的關係上，教育則被視為是維繫社會穩定的手段而非促成社會進步或轉變的工具。另一方面，Gilman 的文化理想則在實現「社會母性」，教育目的在「培養」每個人都能具備「母性」以及面向改變的能力。而教養的方式雖亦是社會集體積極地介入，不過在過程中主要是以自願及說服的方式為之；至於照養兒童的母職工作則被視為社會的核心工作，從事母職工作者更被視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職位。教育內容則較重視實用的學科，教育亦被視為能促成社會進步的工具。簡言之，兩人的教育思想間其實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綜合前述分析，無論 Plato 的《理想國》或是 Gilman 的《她鄉》，其實皆屬 Jacoby 所歸類之「藍圖派烏托邦」。這類烏托邦由於其與現實的差距太大，加上其常常過於強調集體主義的色彩，所以在現代社會中經常被視為是「不可實現」的人類幻想，甚至被視為其萬一真的實現的話，反而會成為對人類帶來負面傷害的「歹托邦」(dystopia)。不過當考察這些作品的形成背景時，可以發現，烏托邦的形成正代表了人們對於其所處當時之現實社會的「反抗」：其中「理想城市」的傳統是希望能夠再更強化對於現實政治及社會的「設計」與「掌控」；至於「桃花源」或 Arcadian 烏托邦傳統則是在試圖對於主宰的意識型態進行「抗爭」下的一種「遁逃」。是以，Gilman 的《她鄉》固然形成於與世隔絕的「桃花源」，但此一撰述體裁是為了免除既有男性主導社會所帶來的既成影響，目的仍在「設計」一個較現實社會更美好的理想城邦，就此而論，《她鄉》實則兼具了理想城市及桃花源烏托邦傳統的意涵，並非單純「緬懷」舊日傳統之烏托邦，反而是「策勵」於社會進步的未來設計。

當然，Gilman 的《她鄉》並非深思熟慮、規模宏大的哲學鉅作，其中仍有許多至今我們仍無法解釋的異想天開及過於美化之處（包括女性的單性生殖、社會母職的設計等），甚至其中還不時流露了白種人優越說的種族主義 (Hausman, 1998, pp. 498-499)。惟衡諸 Gilman 包括《她鄉》在內的烏托邦教育作品，其寫作及出版時間已垂百年，以當時的時代氛圍和女性地位而言，在當時已屬十分開明進步之作，值得今日做進一步的探究。

## 伍、結語

透過這兩部烏托邦作品及其中教育思想的比較，研究者提出下列的省思：

一、儘管在現代社會中，藍圖派烏托邦確有不易實現與導致「歹托邦」的危機的可能性。但就如 Jacoby 所認為的，西方的烏托邦傳統中，尚有反偶像崇拜 (iconoclastic) 的傳統存在，雖然藍圖派烏托邦常被視為烏托邦思想主流，但是反偶像崇拜傳統的烏托邦主義才是真正維繫烏托邦精神之所在。Jacoby 認為，反偶像崇拜烏托邦主義者亦夢想一個「更佳的」社會，不過他們拒絕為其給出精確的尺寸，他們都是形象的抗議者和破壞者。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

主義可以以 E. Bloch 的作品《烏托邦的精神》(*The spirit of utopia*) 為代表，該書從未提出關於未來的具體細節，而是藉著對音樂、詩歌及文學的反省引發出烏托邦的精神，烏托邦的精神便是期待在未來「完全得到滿足的至福」(Jacoby, 2005/2007, pp. 8-9)。

若我們再仔細考察烏托邦作品中身處烏托邦人民所展現的生活形式及精神狀態，撇開其審慎及細密的介入形式及設計不計，烏托邦的人們向來都展現了一種和諧、愜意、和平與愉悅的精神狀態。在反偶像崇拜的烏托邦主義者心中，他們對於這些的烏托邦精神所抱持的態度毋寧可視為一種期待與等待。他們不需要言語描述它們具體的形象，而是用自己的耳朵向這些美好的觀念敞開著，諦聽著從遠處傳來的和平與歡樂的聲音 (Jacoby, 2005/2007, pp. 12, 45)。在烏托邦生活下的這種生活形式與精神，豈不是我們所嚮往的精神境界？

從研究者角度來看，吾人對烏托邦「真正的」內涵精神的強調，應該要重於對烏托邦集體形式對於個人自由控制的批判。故而面對著那些近以烏托邦空想中的種種創新性的社會或教育改革的構想時，我們該有的態度並非是將此視為社會改造的具有速效性的「藍圖」或「萬靈丹」，而毋寧是將其看成具有價值意義及導向的「希望工程」。在烏托邦的作品及想像中，我們應該發現到的是，人們為了提升社會品質及生活層次時所擁抱的信念與熱情，從而藉此能激勵我們重拾對於社會及人性的希望。

二、研究者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對於演進式「動態烏托邦」的重視可能要更甚於理念式「靜態烏托邦」。因為維繫後者的主要力量是基於對統治菁英知識及德性的全盤信任與全權委任；然而，從現實的觀點來看，社會不可能靜止在某個定點上（即便此一定點在當時可能是最理想的社會），固定不變的社會分工及層級可能造成社會的遲滯及領袖的腐化，甚至造成教育的負擔。在這點上，Popper 提出了極為精彩的批判，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深思：

雖我們應當試圖尋求最好的領袖，但我們必須永遠為最壞的領袖做準備。不過這是對於擬加重制度的負擔的批評，特別是對於要加重教育制度負擔的批評—加給教育制度不可能實現的選擇最佳領袖之任務。教育制度不應該負擔這一任務，這樣的傾向會把我們的教育系統搞成賽跑……鼓勵學生為自己的生涯而研究，而非為研究而獻身於研究，亦非真正喜歡他的研究和探求。這樣學生就只研究對自己競賽有用的知識……。(Popper, 1913/1986, p. 305)

在靜態烏托邦所畫分的固定之社會分工及社會階級中，層級較高者享有更多的責任、權力、資源及地位，對於個人而言，教育成為人們晉升上層階級的一種手段，對於社會及國家而言，教育成為篩選優秀人才的「工具」。透過這種教育管道及方式所培育出來的領袖，固有可能成為最好的領袖，惟在靜止理想社會的宣導下，卻也可能蛻變為最壞的領袖，對於整體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至於 Gilman 所宣揚的「人人皆為母親」的教育理念，其教育重點非為個人生涯的晉升，

而是為著個人潛能的充分發展，以及為下一代身心進行設想的完整規劃。從這點來看，Gilman 在《她鄉》動態烏托邦中所提出的教育規劃其實還頗為接近當代著名思想家 A. Sen 及 M. Nussbaum 所共同發展出的「能力取向」(capabilities approach) 理論。此一理論的基本哲學信念在於主張人應該活得像人，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活出人性，而要獲得人在各方面身心及社會生活的存有方式，需要健康、人身安全、理智和判斷、交往結社、參與公共決策能力，然若要確保這些能力，當然就需要保障諸如公共衛生、教育、基本人權、民主制度、平等社會等各種條件（王俊斌，2007, p. 54；錢永祥，2006, pp. 292-293）。為了保障個人能力的充分發展，建置一個人性健全發展的環境，也莫怪《她鄉》中最受重視及最為發達的學科為生理學、健康學、衛生學、心理學及運動的養成等與人類心智能力、意志力、社會奉獻之意願等有關的「實用性」學科。

三、從性向的角度來看，Plato 與 Gilman 可說處於男女兩性特質的「兩端」。儘管自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Plato 的男性烏托邦仍有許多不足及批判之處，然而，其也絕非毫無可取之處。從 Plato 所欲培養的女性形象來看，其與《她鄉》中經過一代又一代演化所產生的新女性也幾無二致，她們一方面體格健康，體力與男性同等充沛，另一方面聰慧理性，又勇敢獨立，每個女性都具備自己的專業能力，足以在專業崗位上充分發揮。

兩者不同之處，仍在於對於「母性」或「母職」此一常與女性相連的特質或職分的看法上，Plato 並未正視母職的重要性，或是說他將其當作私領域的一項特徵，而這種私領域的特徵是有礙於公領域工作的實現及發揮的。對 Plato 來說，要成為國家或社會的人才，照顧及養育兒童的母職工作反而是一個阻力，它一方面會分去了個人對公務的投入，另方面也可能滋生個人的私欲，造成權力者的腐化及國衛的怯懦。Plato 這種對於公、私領域的畫分，或是說將私領域的母職工作排除於正式的教育體制之外的作法，對於日後西方教育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套用 Martin 的說法，就是僅有教育中的「生產活動」才被視為教育的正軌，至於另一向度的「繁衍性活動」卻因而被忽略甚至被排除。而在過往有關教育的定義上，僅有與「理性」、「自主」、「客觀」、「啟發」有關的活動才被視為「真正的」教育，至於和「情感」、「關係」、「直覺」、「訓練」有關的養育活動則多被視為是非教育的活動。若由此一角度來看時，Gilman 烏托邦作品中對於「母職」及「社會母職」的重視，實可成為我們檢視當今教育實踐，甚至重新檢討或拓展教育定義的一個重要參考。

研究者認為，烏托邦絕非作者在「絕望」之下的單純產物—也許寫作的當下作者對於「現實」的實際改造不抱任何期望，然而，其至少是對於「未來」有所企盼的，否則作者不會花費心力於烏托邦的創作與倡導上。專研希望與教育關係的學者 Halpin 即堅持在這個後現代思想充斥的現代社會中，教育中的烏托邦視野仍有其必要性：

我充分察覺到某些烏托邦與烏托邦者在歷史上的不佳名聲。但現在我仍堅持，在教

育中我們需要有新的烏托邦視野（new utopian visions in education）……，而不是放棄烏托邦。（Halpin, 2003, p. 2）

Halpin 表達社會及教育若要進步，我們仍必須懷抱某些價值觀與信念來進行改革，他引用了 R. Rorty 的看法，指出這樣的進步與改革並不是一蹴可幾的，也不是單靠先前某些既有的標準就可達成。

一個完美的社會不會去遵循某些既有的標準，而是一項高度技藝性的成就（an artistic achievement），它必須經過同樣的長時間與艱難的試誤（trial and error）過程，也需要其他人創造性的努力，才能產生。（Halpin, 2003, p. 5; Rorty, 1999, p. 270）

總而言之，烏托邦的視野及想像，可以成為支持並激發教育活動中的「終極希望」，特別是目前的教育實踐已流於漫不經心，並且陷入某種自我耽溺之時，烏托邦的教育思想應該可提供教育工作者某些啟發甚至刺激。願意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基本上對於人性、對於社會、對於人類的未來，應該都是抱持著一種正面的「絕對希望」的樂觀態度，而且教育活動的本身其實也正是一種與「終極希望」有關的「希望工程」，教育正是以培養學生具有無窮的希望作為其主要的目標。烏托邦的教育思想有時雖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夢想，然而它畢竟代表了一種人們為實現夢想所擘劃的藍圖，它在描繪理想社會的狀態同時，其實也為未來的教育提供了一個「終極」的希望與理想，而這種希望與理想，亦正是教育工作者所擁有的最寶貴資產。

## 誌謝

本研究係接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計畫完成（計畫編號：99-2410-H-003-006），特此致謝。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文獻

- 王俊斌（2007）。潛能取向理論與教育公平性問題。*教育與社會研究*，13，41-70。
- 【Wang, C.-B. (2007). Theory of capabilities approach and problems of education fairness. *Formosan Education and Society*, 13, 41-70.】
- 王恒（2008）。柏拉圖的「克里特遠征」—《法篇》與希臘帝國問題。上海市：人民出版社。
- 【Wang, H. (2008). *Plato's expedition to Crete—The problems of "Law" and Greek empire*. Shanghai,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林玉体（1984）。*西洋教育史*。臺北市：文景書局。
- 【Lin, Y.-T. (1984). *West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Win-Join Book.】
- 曾桂娥（2009）。解構與建構—吉爾曼女權主義烏托邦研究（未出版博士論文）。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市。
- 【Zeng, G.-E (2009).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A study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feminist utopi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 蔡聿文（2005）。從他鄉到她鄉—吉爾曼（C. P. Gilman）教育思想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Cai, Y.-W. (2005). *From hisland to herland—The study of C. P. Gilman's educational though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錢永祥（2006）。納斯邦的動物倫理學新論。思想，1，291-295。
- 【Cian, Y.-S. (2006). The reconsideration of M. Nussbaum's animal ethics. *Reflexion*, 1, 291-295.】
- Flanagan, F. (2009)。最偉大的教育家—從蘇格拉底到杜威（盧立濤、安傳達，譯）。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05 年）
- 【Flanagan, F. (2009). *The greatest educators ever* (L.-T. Lu & C.-D. An, Trans.). Shanghai, Chin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5)】
- Gilman, C. P. (1998)。她鄉及黃色壁紙（林淑琴，譯）。臺北市：女書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2 年）
- 【Gilman, C. P. (1998). *Herland and yellow wallpaper* (S.-C. Lin, Trans.). Taipei, Taiwan: Femal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 Gutek, G. L. (2008)。教育學的歷史與哲學基礎：傳記式介紹（繆瑩，譯）。長沙市：湖南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 2004 年）
- 【Gutek, G. L. (2008).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education—A biographical introduction* (Y. Mou, Trans.). Changsha, China: Hu Nan Educ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 Hertzler, J. O. (1990)。烏托邦思想史（張兆麟、楊廉、張豫婉、吳學文、何汎，譯）。北京市：商務印書館。（原著出版於 1922 年）
- 【Hertzler, J. O. (1990). *The history of utopian thought* (Z.-L. Zhang, L. Yang, Y.-W. Zhang, X.-W. Wu, & H. He, Trans.).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2)】

Jacoby, R. (2007)。不完美的圖像－反烏托邦時代的烏托邦思想（姚建彬、董慶蓉、李琴、鄺明艷，譯）。上海市：新星。（原著出版於 2005 年）

【Jacoby, R. (2007).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J.-B. Yao, C.-R. Tung, C. Li, & M.-Y. Kuang, Trans.). Shanghai, China: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5)】

Popper, K. (1986)。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莊文瑞、李英明，譯）。臺北市：桂冠。（原著出版於 1913 年）

【Popper, K. (1986).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W.-R. Jhuang & Y.-M. Li, Trans.). Taipei, Taiwan: Laureat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3)】

## 二、外文文獻

Bartkowski, F. (1989). *Feminist utopias*.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obonich, C. (2002). Plato on utopia. In E.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Retrieved from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lato-utopia/>

Bickman, M. (1998). Thinking toward utopia—R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 of the active mind. *Phi Delta Kappan*, 80(1), 75-78.

Davis, J. C. (1983). *Utopia and the ideal society: A study of English utopian writing 1516-170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s, R. A. (2003). Education, utopia and the limits of Enlightenment.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565-585. doi:10.2304/pfie.2003.1.3.8

De Simone, D. M. (1995).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feminization of education. *WILLA* (Vol. IV; pp. 13-17). Retrieved from <http://scholar.lib.vt.edu/ejournals/old-WILLA/fall95/DeSimone.html>

Forde, C. (2007). *Feminist utopianism & education: Educating for the good society*.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nse.

Gilman, C. P. (1979). *Herland—A lost feminist utopian novel*.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Gilman, C. P. (1997). *With her in ourland: Sequel to herland*. Westport, CT: Praeger/Greenwood Press.

Giroux, H. (2003a). Dystopian nightmares and educated hopes: The return of the pedagogical and the promise of democracy.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467-487. doi:10.2304/pfie.2003.1.3.3

Giroux, H. (2003b). Utopian thinking under the sign of neoliberalism: Towar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educated hope. *Democracy & Nature*, 9(1), 91-105. doi:10.1080/1085566032000074968

Giroux, H. (2003c). Youth,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time: Educated hope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democratic future. *Social Identities*, 9(2), 141-168. doi:10.1080/1350463032000101533

- Green, A. W. (1952). The limits of utopia: Does ‘Big Brother’ smile for 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1(2), 147-154. doi:10.1111/j.1536-7150.1952.tb00420.x
- Halpin, D. (1999). Utopian realism and a new politics of education: Developing a critical theory without guarantees.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4(4), 345-361. doi:10.1080/026809399286233
- Halpin, D. (2001a). Hope, utopianism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31(1), 103-118. doi:10.1080/03057640125603
- Halpin, D. (2001b). Utopianism and education: The legacy of Thomas Mor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49(3), 299-315. doi:10.1111/1467-8527.t01-1-00177
- Halpin, D. (2003). *Hope and education: The role of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Falmer. doi:10.4324/9780203468012
- Halpin, D. (2007). Utopian spaces of “robust hope”: The architecture and nature of progres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35(3), 243-255. doi:10.1080/13598660701447205
- Hausman, B. L. (1998). Sex before gender: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evolutionary paradigm of utopia. *Feminist Studies*, 24(3), 488-510. doi:10.2307/3178576
- Holmes, B. (1967). The reflective man: Dewey. In P. Nash, A. M. Kazamias, & H. J. Perkinson (Eds.), *The educated ma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 (pp. 305-334).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Sons.
- Kahn, R., & Kellner, D. (2007). Paulo Freire and Ivan Illich: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5(4), 431-448. doi:10.2304/pfie.2007.5.4.431
- Kessler, C. F. (1994). Consider her ways: The cultural work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s pragmatopian stories, 1908-1913. In J. L. Donawerth & C. A. Kolmerten (Eds.), *Utopian and science fiction by women: Worlds of difference* (pp. 126-136).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 Knewitz, S. (2006). *Making progress: Pragmatism and utopia in the works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John Dewey*. London, UK: Turnshare.
- Leonardo, Z. (2003). Reality on trial: Notes on ideology, education, and utopia.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504-525. doi:10.2304/pfie.2003.1.3.5
- Lewis, T. (2006). Utopia and educ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4(1), 6-17. doi:10.2304/pfie.2006.4.1.6
- Lloyd, B. (1998). Femin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nd the prison of the familiar. *American Studies*, 39(1), 93-113.

- Maloney, K. E. (1985).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of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A critical analysi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New York, NY.
- Maloney, K. E. (1999).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The origin of education is maternal. In C. Titone & K. E. Maloney (Eds.), *Women's philosophies of education—Thinking through our mothers* (pp. 97-129).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
- Manuel, F. E., & Manuel, F. P. (1979). *Utopian thought in the western world*.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 Martin, J. R. (1985). *Reclaiming a conversation: The ideal of the educated woma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eczkowska, A. (2005). Towards utopianism of educational thought. *Kwartalnik Pedagogiczny (Pedagogical Quarterly)*, 50(3), 5-17.
- Milojevic, I. (2003). Hegemonic and marginalised educational utopias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world.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440-466. doi:10.2304/pfie.2003.1.3.2
- Okin, S. M. (1977). Philosopher queens and private wives: Plato on women and the famil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4), 345-369.
- Olssen, M. (2003).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repressed’ utopia of the present: Moving beyond Hayek, Popper and Foucault.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526-552. doi:10.2304/pfie.2003.1.3.6
- Papastefanou, M. (2008). Dystopian reality, utopia thought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27(2&3), 89-102. doi:10.1007/s11217-007-9092-9
- Plato (1974). *The republic*. London, UK: Pan Books.
- Rorty, R. (1999).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Russell, B. (1945).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 Seigfried, C. H. (1996). *Pragmatism and feminism: Reweaving the social fabric*.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uissa, J. (2001). Anarchism, utopias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35(4), 627-646. doi:10.1111/1467-9752.00249
- Tuana, N. (Ed.). (1994).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Plato*.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Upin, J. S. (1993). Charlotte Perkins Gilman: Instrumentalism beyond Dewey. *Hypatia*, 8(2), 38-63. doi:10.1111/j.1527-2001.1993.tb00090.x
- Van Heertum, R. (2006). Marcuse, Bloch and Freire: Reinvigorating a pedagogy of hope.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4(1), 45-51. doi:10.2304/pfie.2006.4.1.45

Young, M. (2003). Curriculum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Updating the Enlightenment?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3), 553-564. doi:10.2304/pfie.2003.1.3.7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  
2013, 58(1), 1-27  
doi:10.3966/2073753X2013035801001

# Comparative Study of Utopian and Educational Thoughts Between Plato's *Republic* and C. P. Gilman's *Herland*

Yung-Chuan Fa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For this article, we mainly compare and analyze two important writings regarding "utopian" educational proposals: Plato's *Republic* and C. P. Gilman's feminist utopian novel *Herland*. They both are utopian and educational classics, and their ideal societies are both communist societies, but the basic organizing principles and educational proposals vary in numerous ways.

After reviewing the above-mentioned two utopian writings and other related studies, we summarize the study's conclusion: (1) The utopian spirit of modern society should be utopianism consistent with the "iconoclastic utopian tradition"; (2) we require placing more attention on an evolutionary "dynamic utopia" than a theoretically "static utopia"; and (3) the female images that Plato and Gilman attempted to cultivate are similar, but their emphases on "motherhood" are of different degrees. Plato did not consider motherhood, but Gilman honored it as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value, and we argue that such a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for people to reconsider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Keywords:** motherhood, *Herland*, utopia, educational thought, *Republic*

